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爱心通过它创造了奇迹。

## 互联网上的童话

柯云路

拍下了那些鞋子。

云南省昭通市大关县吉利镇黄荆村瓦房小学是无数封闭在大山里的普通小学之一,这个学校小到只有一位名叫毛利辉的老师和33个10岁以下的学生。

毛老师在2006年贷款买了一台电脑,又在父母的资助下添置了数码相机。有了这两件“武器”,大山里的孩子们获得了与外界沟通的途径。毛老师经常用文字和照片记录下他和孩子们的生活,然后上传到互联网上。

那是一个寒冷的雪天,课后雪已经停了,大山里一派“银装素裹,分外妖娆”的景象。毛老师走出教室,准备拍摄雪后的山区美景,然而很快,那些在泥泞的操场上玩耍的孩子们吸引了他的目光。在湿滑的雪地上,孩子们的小脚上套着一双双破烂“走光”的鞋子。

毛老师心酸地用相机

2006年12月11日晚,毛老师将孩子们脚上“张开了嘴巴的雨鞋”“没有鞋后跟的胶鞋”“用红头绳勉强绑在脚上的烂鞋”和“根本不对称也完全不合脚的破鞋”一一发在网上,同时写了孩子们生活与学习的窘境,帖子名为《学生“走光”,我哭了》。

短短几天,帖子被网友们转发到各大网站、论坛和博客上。2006年12月24日,毛老师意外地接到镇邮电所的通知,叫他去领包裹。那是网友们自发捐赠的,8个箱子里装着送给孩子们的33双新鞋和33双新袜子,还有许多衣物。

第二天恰逢圣诞节,学校里的孩子们全都换上了新鞋新袜,每个人都有了两套新衣服。

事情至此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一位媒体工作者看到毛老师的帖子后向同行推荐,新浪网更是把整个帖

子放到了博客首页,仅一天时间点击量就达到18万次,留言2000多条。无数网友的心被这些泥泞中的小脚牵动,大量包裹和信件涌向这所山村小学。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个包裹同时到达,致使当地邮电所的工作面临瘫痪。

在一个包裹里,除了赠送的衣物,还有一封信,信中写:“亲爱的孩子们,我们从网上得知你们的生活现状,我们的心被深深触动了。生活在上海的我们只是一群平凡的公司职员,每天在宽敞明亮的写字楼工作,我们对生活的期许已经慢慢变得麻木而现实。你们生活的那种环境曾经是我们满足猎奇心理的好去处,直到看到你们的鞋子、衣服和眼神,我们才了解了生活的另外一些面貌。”

毛老师将全校的孩子们集合在一起读了这封信,然后问:“今天有那么多人

在帮助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大家的帮助?”

孩子们齐声回答:“爱!”

毛老师说:“对,这是最关键的,也是那么多好心人寄东西来让你们感到温暖的一个初衷,你们要如何报答他们呢?”

孩子们说:“取得优异的成绩。”“长大以后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助,而是自己去帮助别人。”

孩子们回答得真好。希望这些孩子记住童年时代这段温暖的经历,并且化为长大后帮助别人的动力。

到目前为止,这所小学一共收到6000多个包裹,2万多件衣服和文具,全镇近3000名学生,2万多名群众分到了捐赠的衣物,而仓库里待发放的衣物还可以让几千人得到温暖。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爱心通过它创造了奇迹。

摘自《金陵晚报》

## 虚张声势退敌兵

确定匈奴攻击的重点就是云中。因怕影响邻郡防务,廉范没有请求增援。

然而,匈奴这次进攻的重点正是云中。随着敌兵攻势越来越猛,云中兵力很快难以抵挡。

一天夜里,廉范命令

军营里所有士兵都点燃火炬。通常火炬都是一头点火,一头手持,廉范发明了“十字火炬”,一头手持,三头点火。他让士兵们分散开来,这样匈奴兵远远望去,廉范手下士兵一下子增加了两倍。匈奴兵以为

对方增援部队已到,十分恐慌,攻势顿时减弱。

天亮时分,匈奴兵开始撤退。廉范趁机发起进攻,匈奴兵没料到汉兵会反击,一时手忙脚乱,争相逃命。在汉兵猛烈追击下,匈奴兵大败而逃,从此不敢再犯云中。

摘自《一生要懂得350则智慧》

##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一次,这个“天才疯子”在植物园和橘子花说悄悄话,管理员看他神情诡异,便过来问他名字,他一脸迷惑地说:“如果你能告诉我我是谁,我会多么感激你啊!”

## 大哲学家有大个性

80岁不出故乡

一步的康德

世界上的大哲学家几乎个个都游历丰富,见多识广,惟独被称为“德国哲学革命的先驱”的康德是个例外,1724年出生的他活了整整80岁,却从来没有离开他的故乡哥尼斯堡一步。康德有42年的工作时光是在讲台上度过的,他上的课多达十数门,除了和哲学相关的课程外,还有矿物学、教育学等,甚至还有“要塞建筑术”和“烟火制造术”。

他一辈子没有结婚,过着单身而循规蹈矩的呆板生活,每天定时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吃饭、散步,守时严格到分秒不差,比闹钟还准时,以至于邻居都可以按他的行踪来对钟表。康德饭后散步的习惯风雨无阻,平生只破例过一次,那是因为被卢梭的《爱弥尔》所吸引而读了一口气读完。正因如此,海涅评价康德说

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

康德的著作文字艰深,大量使用抽象的专用名词,面对别人的批评,他说:“文章能够写得复杂不是更好吗?又何必力求简明来迁就读者呢?”

“木头人”黑格尔

黑格尔被誉为“美学上的金字塔”,但是他在耶拿大学做编外讲师的时候却是有名的“木头人”,他盛年驼背,瘦削的脸上始终是严肃的表情,思考问题的时候经常发呆,有时候思考一个问题竟会让他在原地呆上一天一夜。散步时下雨来他他浑然不觉,一次散步回家时才发现一只脚上居然鞋子不见了。

黑格尔不善言辞,上课经常翻阅笔记,费劲地字斟句酌,结果是浅显的东西他越讲不清楚,学生于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木头人”。更好笑的是,他经常记错时间,在别人的上课时间走进教室,打开讲义就开始了

课,让师生们哭笑不得。也正因此,选修他课的学生最后落到只有11人。校方也对他很不满意,连副教授的头衔也是歌德出面才帮他争取来的。

但黑格尔来到柏林大学后却备受推崇,后来还被提升为校长,其黑格尔主义风行一时,年轻的叔本华不服气,自负地要求和黑格尔同一时间上课,并大骂黑格尔是“江湖骗子”,说其哲学“四分之一是胡说八道,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但叔本华最后惨遭失败,听他课的学生最多时只有3个人。

“痛苦动物”叔本华

叔本华是一个悲观主义哲学家,他自命为“痛苦动物”。他从小厌恶轻佻虚荣的母亲,并由厌恶母亲发展到厌恶所有人,他说:“我从懂事以来,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他颇为自得的博士论文居然被身为小说家的母亲斥为“像药剂师开的一张药方”。母子俩自此

## 西南联大的茅草屋

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毁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校委会告诉他们,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室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他们再作修改。

此时的梁思成不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

“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梅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梁扭动着脸,自言自语似的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干什么啊?”梅把梁扔在桌上的图纸一张张收好说:“思成,困难当头呀!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没有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以你的大度,请再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第一流的清华园,行吗?”梅的

声音不大,却有些颤,梁思成听着,心又一次软了。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人们无法相信这会是建筑大师亲手设计的。可几十年后,正是从这些茅草房里成长起来的那群穿草鞋的孩子,登上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领奖台,引爆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制造出中国第一台亿次银河巨型计算机……

摘自《中国社会导刊》

## 指路

王安诺

们称我“大姐”或“阿姨”,用生硬的外乡口音说出上海的地名,令人感到他们身后艰辛的背井离乡之路而心酸。

一次下班走到延安西路镇宁路口时,一名外乡少年向我问路,他的身后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载着一个大纸箱,用麻

绳捆着。他焦急地问:“阿姨,到程家桥还有几里地?程家桥靠近上海动物园,57路公交车过去足有八九站路。暮色苍茫,天空飘着霏霏小雨,行人匆匆低头赶路,而这孩子还有很远的路要赶。他最多十八九岁,满脸稚气,瘦瘦的,头发淋湿了,一绺绺贴在

脑门上。他特地下了车来问还有多少路,一定是累了,急了。我问他从哪里过来,他说志丹路甘泉新村那边,去程家桥送货。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说实话。他大概只走了一半路程。最后我说,大概还有五六里地的样子吧。我想这个距离不太远也不太近,我没有撒太大的谎,也能够安慰他焦急的心。

摘自《意味》

## 美国人恋爱特有趣

说:“我不能集中精力在一个女人身上。”有的女人也会说:“我不在乎,不过是为了好玩。”当然,有的女人会说:“我希望保持长期交往。”

他们即兴恋爱,如果有一方提出结束,另一方不会纠缠,这是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别。中国人就不一样了,只要一方提出结婚恋爱关系,另一方会觉得受到伤害,甚至会报复。

美国女人恋爱,肯定有性生活,中国人恋爱不一定有性生活,尤其未婚青年恋爱期间,绝大多数中国女孩不会同意男友的性要求。还有贞节观念,未婚男青年知道女友有过性关系,会不开心的,甚至不再接受她。美国人完全不在乎。中国人在恋爱期间花钱,大多是男人付钱,不仅付两个人的娱乐费用,甚至包括买礼物。中国女人靠上一个有钱的男人,家里也会沾光。小时候,邻居有一个姑娘,对象是司机,

常常会无端地想念一些人。想起一些人时,总感觉自己的生命是切成一段段的,每一段都和一些人联系在一起。没有这些人,生命似乎也就苍白贫乏,没有着落。但也不单是朋友,一些不是朋友而不得不与他们发生联系的人,甚至一些憎恨的人,也常常要想起他们。所以,生命可以被分成这样:一些被你所爱的人分去了;一些被你恨的人分

## 想念

徐智慧

底,有一些莫名的颤动,若隐若现,欲升还沉,你想紧紧地抓住他们,但他们稍纵即逝。

当你想念滑过你生命的那些人时,所有的爱憎都蒙上一层淡淡的晕光。透过晕光,你再看着他们,爱和憎都化作一种体验生命的深广的欣慰了。

摘自《现代快报》

## 名流故事

## 我——全世界最悲伤的字

[美]希拉里·克林顿

2007年7月29日,美国《纽约时报》公开了20世纪60年代一位大学女生写给笔友的30封信件,信件的作者正是当今美国参议员、前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信中的大学女生希拉里,有时忧心忡忡,有时滔滔不绝,有时心事重重。有时热情洋溢,与她今日端庄矜持的政治人物形象实在有天壤之别。

亲爱的皮沃伊: 与你的通信是我通向一段时间、一个地方和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的窗口。所以,谢谢你抽空倾听这个自我而忧郁的我。讲述一个耶鲁大学生的心事。

我觉得自己得了“二月抑郁症”。我经常在床上度过一个漫长而又停滞不前的早上,时不时无聊地逃避,我真讨厌这样的自己。本周日,我和一帮平庸且让人厌烦的人一起狂欢后昏昏欲睡——我同情他们,但我更同情我自己。

前不久,我曾和达特茅斯学院一个男孩共度了一个周六的晚上,尽管如此,我仍然对身边的男大学生感到不屑,他们太关注“自己”,却对“男子汉”的含义一无所知。现在正给你写信的我坐在这里——一张偷来的桌前,身穿一条丁尼布喇叭裤,一件从未熨过的工作服,戴一顶漂亮的紫色绒帽子,一条和短上衣紧扣在一起的围巾垂下。看起来并不符合其他女学生眼中“时尚”的标准,对吧?因为我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自我检讨和思考上。

还逃避学,我真讨厌这样的自己。本周日,我和一帮平庸且让人厌烦的人一起狂欢后昏昏欲睡——我同情他们,但我更同情我自己。

前不久,我曾和达特茅斯学院一个男孩共度了一个周六的晚上,尽管如此,我仍然对身边的男大学生感到不屑,他们太关注“自己”,却对“男子汉”的含义一无所知。现在正给你写信的我坐在这里——一张偷来的桌前,身穿一条丁尼布喇叭裤,一件从未熨过的工作服,戴一顶漂亮的紫色绒帽子,一条和短上衣紧扣在一起的围巾垂下。看起来并不符合其他女学生眼中“时尚”的标准,对吧?因为我把大多数精力都放在了自我检讨和思考上。

恩格斯说:“时间没起点。”庄子更早就说过类似的话。但他们指的是宇宙之时空。而人做什么却是坐标的,有起点,可寻其始终。

重拾画笔,便有起点。那是1983年的秋天,在北京东交民巷的15号宾馆。中国当时很多著名画家轮流在这里作画。我经常来,黄胄是这次创作活动的牵头者,他常住这里,我和他那时交往频繁,聚一聚,聊一聊,十分惬意,他约我经常来。

一天晚上,我和黄胄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亚明进来了,见了我这样招呼:“哦,你好,电台的朋友。”也不落座,就跟黄胄说:“我有一个朋友想要你一幅画,给点面子画一张吧。”黄胄说:“你没看我正谈事

“我”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字眼,我的思考通常就是一个自我分析的过程。我常常漫无目的地在词语的海洋中穿行。我享受太多了,春假、写信……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理由的。可是既然人生是荒诞的,我为什么就不能荒诞而快乐地度过呢?

我在迷茫中感到矛盾,我自认为是一个“行动者”,希望找到一个远大的、实际的理想,希望致力于开拓人生、改变社会。皮沃伊,有时候我感觉你和其他美国大学生相比太清醒了。虽然你和我一样跨入了名校的大门,可是你满意自己目前扮演的角色吗?你似乎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反应者”而不是“行动者”,你习惯于让周遭事物决定你的人生。这真是可怕!

## 重拾画笔

赵忠祥

愿,但来而不往非礼也,当此之时,他就是一百个不情愿也说不出口。我看那是草草一挥,一蹴而就。

当然,正如范曾说:“大家就是大家,大家的随意之作,也是大家风范。”亚明告辞,拿走了黄胄那张画,我想多看几眼已再无机会,不知花落谁家。话说当时黄胄伏案看了看亚明的画,大概觉得近景和远山相隔太宽,缺乏画面的呼应和连气。于是他提笔补了一群飞鸟,和一个古人,着墨不多,却使画面鲜活起来,且浑然一体。

他对朋友,真是没得说了。亚明把黄胄的四驴图

拿走了,我头一次看到黄胄那种作画姿态和构图方法,觉得心动不已。话已出口边:“劳驾您给我也画一张那样的吧。”但终于没说。我从不为自己开口求画,朋友主动送我,我十分感谢,会永远珍藏,但我不会开口去要。我这辈子有个规矩,多么令我动心的节目,我也从未求过任何人给我参与的机会。你用我,我全力以赴;没想到用我,我何必开那个口?47年的工作过程中,我兢兢业业去干给我的活儿,但开口求人,我平生不屑。

从黄胄处告退,带走的是一个愿望,那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从那一刻开始,我重拾画笔。

摘自《意汇》